

doi: 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6.011

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光辉历程中,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坚持将文化建设摆在国家建设的重要位置。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统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些成功的基本经验,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遵循。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毛泽东; 习近平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9)06-007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始终坚持将文化建设摆在国家建设的重要位置,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坚持“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统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认真总结这些成功的基本经验,不仅为我国积累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确立了重要遵循。

一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随着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毛泽东当年的这句名言再次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熟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道路,我们深刻感受到,从改造旧式文化教育、资产阶级旧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从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锻造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

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是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确立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更是我们今后必须牢牢坚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起步之初,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就是一个非常明确而坚定的重要原则。毛泽东不仅代表党中央对如何搞好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而且一步步形成、完善了毛泽东文化思想。正是在党的领导下,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领域呈现出的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甚至有的文化界人士意识形态错乱等问题,党主动加强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改造旧式文化教育,帮助旧社会过来的文化界人士加强思想改造,引导、教育他们广泛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以克服封建思想、帝国主义奴化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确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0年5月29日,毛泽东就召开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同教育部负责人谈高等教育工作时强调指出,旧式学校是资本

收稿日期: 2019-07-12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MYYCX20180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MZD048)

作者简介: 朱继东(1975—),男,山东东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长聘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文化安全与建设研究会理事长,法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党建设、世界社会主义和新闻传播等研究。

主义的,我们的新式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①。1951年10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致开幕词时强调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②。1951年11月26日,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反映的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等倾向,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在整风学习报告中做出指示“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③。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发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总结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④。3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⑤为如何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指明了方向、做出了部署,推动着各级党委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引导着文化工作向健康方向发展。正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主动关怀下,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不断加强,文化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不仅使得越来越多文化界人士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和主动接受党的领导,而且也推动着越来越多曾经有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积极主动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一贯风格,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他明确而一贯的要求。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明确强调提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不仅进一步强调,而且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运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体现。他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不仅亲自审定收录的每一篇文章,而且为不少文章写了题解、注释。此外,他还非常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普及宣传,鼓励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撰写、报刊组织刊登理论普及类的解读文章,帮助广大党员、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支持和鼓励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得到传播,并成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很多人就是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相关的解读文章开始了解、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谆谆告诫“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⑦“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⑧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⑨1973年12月14日,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部分政治局成员谈话时又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⑩一次次耐心教导、特别强调,再加上他亲自领导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文艺、哲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哲学观等得以确立,引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迎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页。

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比较重视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坚决支持对传播错误思潮、制造思想混乱的《苦恋》等文艺作品的批判,有力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初文化领域出现的混乱局面。《苦恋》事件是改革开放之初文化领域思想混乱的一个缩影,是围绕白桦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在《十月》杂志上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以及据此摄制的电影《太阳和人》展开的一场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中加强党对文化建设领导的重要性、迫切性。因为《苦恋》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发表后就引起文艺界的争论,并遭到批评,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也要求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有关负责同志关注影片的拍摄。但是,《太阳和人》不仅在1980年底完成拍摄,而且竟然在1981年1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得到多数人的肯定或基本肯定,甚至有的人还给予高度赞扬。邓小平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针对有些人对《苦恋》问题表现出来的犹豫、暧昧甚至姑息纵容等态度,1981年3月27日,他在同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评,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①在他的支持下,《解放军报》在批判《苦恋》问题中起到了引领作用,4月17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文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等,4月20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红旗》《时代的报告》《北京日报》《文学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也纷纷发表对《苦恋》的批判文章,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乃至错误认识。7月17日,邓小平召集周扬、王任重等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肯定了《解放军报》对于《苦恋》的批判,提醒大家要注意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存在的涣散软弱等问题,并进一步指出

了剧本《苦恋》和电影《太阳和人》存在的严重问题。“《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②并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③1983年10月12日,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④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⑤邓小平这些讲话直面当时存在的众多问题,对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推动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⑥并进一步强调“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⑦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领导同志对他的话并没有真正重视,导致了更多更严重问题的出现。1989年9月16日,他指出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39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8页。

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页。

⑦《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48页。

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①邓小平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一次次提醒全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这些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的最重要原则^②。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坚持了毛泽东当年要求的“政治家办报”,而且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③并特别强调了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2014年10月15日,他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④10月20日,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⑤。习近平不仅一次次强调了党的领导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就如何更好地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做出了指导和部署。正是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为标志,我们党在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坚决纠偏纠错、拨乱反正,党的领导切实得到加强,推动着文化建设在新时代沿着正确方向步入发展快车道。

正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文化、党管意识形态,高举文化自信的旗帜,确保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前进方向、发展道路,使得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宣传思想领域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总结为“九个坚持”,第一个“坚持”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另外还有“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⑥等,“九个坚持”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必须深刻把握、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二 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但同时,由于受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影响,也出现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个别同志不能科学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甚至科学技术问题,对一些文化、艺术乃至学术问题动辄上升到政治高度,采取贴标签、扣帽子、打棍子等错误方式加以处理,造成了不良影响,也阻碍了文化建设的推进。也许正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毛泽东在文化建设中不仅倡导和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进方向,并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统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遵循确立下来并长期坚持。

“双百”方针并不是一下子提出来的,而是有一个发展形成的过程。1951年3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⑦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主席的题词也迅速为全国人民所熟知。5月5日,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②张波、杨佚楠《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生成逻辑和时代意义》,《理论探讨》2019年第3期。

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⑥张洋《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1版。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

‘百花齐放’。”^①毛主席的题词和政务院的指示成为鼓舞、激励多种戏曲形式乃至多种文化形式并存和发展的重要方针,激励了很多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②“百家争鸣”这一重要方针为什么首先从历史问题上提出?是因为当时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正在进行一场大争论,毛泽东本人也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而“百家争鸣”的提出,则为如何解决这样的争论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针。第二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更是以此作为办刊方针。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毛泽东也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将其确立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指导方针。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专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八个问题中的第五个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③这是他第一次把“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并列放在一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讲话。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详细阐释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④5月2日,他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时再次强调了“双百”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⑤并进一步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文学艺术、发展科学文化的指导方针进行公开强调,标志着“双百”方针正式成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很快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同,并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为进一步推动“双百”方针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毛泽东一次次提醒、告诫大家。1957年1月27日,他在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时说“这个方针,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从对立统一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⑦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双百”方针。他不仅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⑧而且进一步强调“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

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②《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4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①“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②“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③在此基础上,他还总结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④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双百”方针绝不是暂时性、可有可无的,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要求全党要增强坚持“双百”方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该害怕批评,更再次宣告了“双百”方针在理论上、实践上的极端重要性,为如何更好地坚持“双百”方针指明了前进方向、做出了科学部署。

1957年3月8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他再次谈到“双百”方针,批评有的人因为怕放出不好的东西来而不认可、不执行“双百”方针,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⑤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指出怕放的人“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⑥。进一步鼓励大家要不怕批评,要

积极、主动地坚持、贯彻好“双百”方针。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坚持下,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坚持“双百”方针的重要性、迫切性,我们党在探索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道路。

因为“双百”方针不仅合乎科学文化发展规律,而且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是真正能够实现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进步、繁荣的正确方针,深受广大科学文化界人士的欢迎,也在全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但是,在“双百”方针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有些人却把其理解成为是不受任何约束、没有任何底线的自由,由此暴露出一些问题,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1957年1月27日,他在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就强调“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⑦3月8日,他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⑧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深入阐释、科学完善了“双百”方针:“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⑨强调了坚持“双百”方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占统治地位,这是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从没有否定过“双百”方针,反而再三做那些因为“双百”方针贯彻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而对其持怀疑、否定的人的工作,告诫全党要把这个方针长期坚持下去。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0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①“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②不仅再次强调了“双百”方针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而且指出了其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推而广之到一切工作中。3月29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他不仅强调“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③,而且进一步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④1958年9月21日,党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戏曲的请示报告时再次强调“戏曲工作仍然应当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⑤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针对有些领导同志不让人讲话甚至惯于拿帽子压人等问题,他特别指出:“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⑥“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⑦“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⑧“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⑨不仅强调要让人讲话,而且要积极、主动创造条件

让人说话,甚至鼓励要允许人讲错话、要允许人保留意见,并要求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这是从另一个方面提倡、贯彻“双百”方针,既是对全党的一种期待,更是一种要求。

一直到了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江青谈话时仍特别强调“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⑪7月25日,他对电影《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对江青和当时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批判《创业》的指责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映该片的来信做出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⑫可见毛泽东对“双百”方针是一直坚持的,并且对违反“双百”方针的言行一直在进行批评、纠正。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为了更好地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二为”方向这一概念,但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却实际上一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并坚持和真正做到了“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统一。为了谁,这是文化建设不容回避的根本性的大问题。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多次强调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以此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1940年1月9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就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⑬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⑤《中国共产党宣传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311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⑪《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页。

⑫《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页。

⑬《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页。

题。”^①“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②并于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进一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③就是强调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1949年7月1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在将于7月1日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期望并相信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④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立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这不仅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重要的原则和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把“人民”两个大字写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上,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时,进一步要求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一步确立了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并同时强调文化建设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其放任自流,而是重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大家敢于进行思想斗争,强调批评和斗争是“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⑤1963年12月12日,他在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

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并批评“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⑥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党和国家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相结合,引导以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科学文化工作者积极主动地深入基层、深入到工农兵中间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争做表率,再加上党领导人民开展的扫盲运动,使得整个文化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大量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工农大众的感人事迹以及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成就、新社会的良好风尚的大批优秀作品纷纷涌现,不仅深受人民群众喜爱,而且为全社会实现移风易俗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让更多人深刻认识到,“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相结合,不仅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反而能够不断加强、巩固其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不仅继续坚持“双百”方针,而且推动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对当时一度有些迷茫甚至错乱的文艺界起到了指引方向、凝聚力量的作用。1979年10月30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⑦“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⑧在强调要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双百”方针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仅强调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政治属性“文艺是不可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页。

④《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页。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而且特别谈到了如何科学全面正确地理解“双百”方针:“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①澄清了当时不少人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在告诫全党要沿着正确道路坚持、贯彻“双百”方针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决不能搞资本主义那一套。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此,“二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前进方向被正式确定下来,并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

针对有人以要坚持“双百”方针为由,反对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1981年7月17日,他召集周扬、王任重等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时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②这个态度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人的错误认识,也引导着更多人正确理解、贯彻“双百”方针。

在新时代,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统一,推动着文化建设发生历史性巨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③“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

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④这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史上、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不仅强调了要坚持“双百”方针,而且强调了要坚持“二为”方向,并强调这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文艺工作要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并阐明了怎样做到以人民为中心。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⑤2017年9月,他就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益求精、潜心磨砺,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不断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塑造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坚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先是肯定了“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弘扬了中国精神,凝聚了中国力量,为我们党团结带领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页。

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页。

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⑥《习近平就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 坚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 刘云山出席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人民日报》2017年9月28日第1版。

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①然后进一步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③“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④2019年3月4日，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⑤一次次强调要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且大多数时候是把三者联在一起加以强调，就是告诫我们，不仅“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三者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必须把三者都坚持好、贯彻好，才能真正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搞好。

三 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参加革命以后从来没有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而是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强调应当厚今薄古、要有民族自信，但却特别注意对中华传统文

化、外国文化的批判和吸收，坚决反对盲目复古、排外主义、“全盘西化”等论调。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14日，他在党的扩大的六届中全会上政治报告中就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⑥1940年1月9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⑦就是告诫大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决不应该也不能割断历史，绝对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是要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的东西和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坚持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他还明确提出“民族的科学的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⑧明确把民族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第一要素加以强调，体现出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高度自信，这是他高度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自然流露，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

毛泽东虽然很少出国，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根本没有出过国，但他对外国文化并不排斥，即使是对资本主义文化也不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在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斗争、吸收、融合、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能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⑨并旗帜鲜明

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⑤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第8期。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地批判“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强调决不能当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文化必须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正是因为他对民族文化、外来文化都一直保持着清醒头脑、有着科学认识,又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探索出了一条既“以苏为师”又不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坚决反对西方文化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又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能力,不断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①。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谈到如何科学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②并且,这个原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如何科学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外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和分析面临的新形势的基础上,他始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原则,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道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整体上基本是封建性质的,中国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比较深,不少人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封建文化所误导,所以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而且特别注意对封建思想进行批判,并亲自领导、指挥了几次批判。1950年3月14日,他复信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蒋竹如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无律的诗,即兄

所指民间歌谣体尚是很有用的。”^③1951年5月20日,针对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过多所暴露出来的文化界思想混乱等问题,他批评指出“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④1954年10月16日,他又结合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批评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⑤并且是把《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在一起批判,通过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错误思想的批判引发全党的思考。他这么做,就是提醒全党要注意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好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在封建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分清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才能不被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1957年3月8日,他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⑥1960年12月24日,他在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并进一步说“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⑦不仅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传统文化遗产中的毒素和糟粕,对此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且引导大家如何科学看待和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亲自去做选择、剖析、批判、利用等工作,真正做到批判地挖掘、改造、继承、转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推进社会

①朱继东《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35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主义文化建设。

对于外国文化,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主张“洋为中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号召大家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文化等,特别是学习苏联。1953年2月7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为了消除一些人的抵触情绪,他列举了我国唐朝唐三藏法师不远万里去印度取经和近代掀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民主主义、科学的高潮这两个学习外国的例子,论证中国人是不拒绝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并且,这种学习对我国进步是有帮助的。在此基础上,号召采取真心实意的态度广泛地学习苏联“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①他提倡的向外国学习,不仅包括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更包含了向所有国家学习。1955年10月15日,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时就表示,日本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②在1956年4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③并进而在反思向苏联学习时出现的“人家的短处也去学”等问题,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发展原则,提醒大家要注意“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

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④“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⑤但同时,他也明确提出反对“全盘西化”,强调要批判地学习国外。1956年8月24日,他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会见时的谈话中特别强调“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⑥“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⑦“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⑧这就是告诫我们,要积极向外国学习,但这个学习是要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要明确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地发展壮大我们中国,决不能迷信外国,更不能搞“全盘西化”那一套,而是要在批判地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创造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先进文化。这是对“洋为中用”的生动诠释,确立了我们在学习外国时应该牢记并认真坚持的原则。

毛泽东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学习外国的问题,并及时指出、纠正发现的问题,他的这些思想也影响到了其他领导同志。1960年12月24日,他在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你们提到中国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①并进一步强调“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②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特意谈了为谁服务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③“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④对比不难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在如何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周恩来真正明白、领会了毛泽东的思想,并去认真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继承、坚持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1979年10月30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不仅强调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而且明确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⑤“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⑥在他的推动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

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⑦但是,由于崇洋媚外思想一度盛行,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

新时代,习近平不仅很好地继承、坚持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而且通过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大发展中更好地走向世界。他非常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创新,强调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被誉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⑧。2013年12月30日,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⑨2014年10月15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⑩“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⑪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警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22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

④《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⑦《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40页。

⑧孙亮《新时代文化建设原则的历史辩证法基础》,《理论探讨》2019年第1期。

⑨《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页。

⑩《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⑪《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

⑫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同时,他把“洋为中用”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强调要承认和尊重外国文化,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2014年3月27日,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②2014年9月24日,他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对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③不仅强调了中华文化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而且明确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在推陈出新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④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习近平坚持、发展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既继承好发扬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性互动、和谐统一,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以文化自信坚定价值自信,又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强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既相互理解、尊重、包容,又努力消除误解、超越偏见、化解敌意,主动借鉴、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在借鉴、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越来越展现出21世纪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世界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强大的优越性。

On Basic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New China's Cultural Building

ZHU Ji-dong

(Institute of Marxism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glorious 70-year history of New China,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all the leaders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building, putting it at a pivotal place in nation-building. They have adhered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cultural building and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to the unity of the policy of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as well as the direction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serving socialism”. They have insisted on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ulture by “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and “making foreign things serve China”, etc. All these successfully basic experiences are not only the preciously spiritual wealth of our socialist cultural building, but also the important rules for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New China; cultural building; the policy of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Mao Zedong; Xi Jinping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260页。

③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